

儒学在冰上丝路： 芬兰儒学百年文化融构与当代理论镜鉴

高源

〔摘要〕 儒学何以在冰上丝路上传播和融构是当前探索中欧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要且新颖的论题。不同于以往欧陆儒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北欧语境特别关注伦理道德背后的天道根基及其与本土新教神学的价值互动。作为北欧儒学的重要镜像，芬兰文语境对儒家经典的早期译介与研究呈现以神释儒的诠释特质，深嵌于科和宁、王为义等近代传教士探索中国哲学形上精神的神学实践。然而，经尼基拉夫妇及高玉麟等汉学家的不懈努力，当代芬兰文儒学译介与研究逐渐脱离基督教神学传统范式而转向回归儒学本义的诠释路径。这种诠释策略转型折射出儒耶异质信仰坐标相遇中核心价值观的调适与互鉴，凸显出不断还原儒学本真并促进“形上本体-形下伦理-范畴术语”等多重释义立体对话的历史进程，不仅为当前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为拓新中国传统哲学译介与海外传播理论提供了崭新理论视阈与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冰上丝路；北欧儒学；文化融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I53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4)04-0036-12

儒学在欧洲的传播早在15至16世纪即已开启，郑和下西洋所开辟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引领的新航路地理大发现乃是其重要的历史背景。^①然而，与此“海上丝绸之路”背

〔作者简介〕 高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体系副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20024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儒佛道哲学典籍的芬兰文译本研究”（21CZX044）；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北欧哲学与文化传播”（WKCX029）

① 郑和下西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拓与早期儒学传播的标志性事件。其中，“声教洋溢乎四海、仁化溥洽于万方”乃是彰显国威与传播礼乐教化的重要形式。据巩珍所述，郑和在西洋各地通过“通事”翻译而宣孔孟之学（《西洋番国志·自序》）。这些线索说明，郑和下西洋并非局限于商贸层面的外事活动，更重要、更深层次的是担负传播儒学礼乐并昭示皇家德化四海的历史使命。因此，郑和及其奉敕“声教〔儒家礼教〕”的历史贡献，不应被忽视。然而，有哪些具体的儒家经典被“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郑和裹挟入洋，目前仍需更充分的史料发掘与进一步的原始文献探察。关于彰显明朝国威与礼乐教化之阐述，可参阅马欢《瀛涯胜览》序》《瀛涯胜览》纪行诗》与巩珍《西洋番国志》（见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巩珍撰、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5—6页）。与郑和奉敕“声教”线索相应，西欧地理大发现以降的高母羨、罗明坚、利玛窦、高一志等耶稣会士来华则从另外一个维度带动了儒学典籍在欧洲的多语种译介与传播。关于儒经如何最早进入欧洲的学界研究，可参见梅谦立、王慧宇：《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第118—124页；梅谦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高源：《儒家典籍在欧洲首次译介考辨》，《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207—218页。

景下的东学西渐历史图景不同，儒学在北欧世界的传播相对滞后，展现了“冰上丝绸之路”视阈下东西方交汇的另一种传播模式。这种“滞后性”，某种程度上与斯堪的纳维亚沿线国家复杂且相对独立的冷门语言系统有关，同时也与北欧诸国迥异的信仰形态及宗教认知心理等因素不无关系。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着墨最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①然而，冰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历史关联，以及儒学如何“北渐”而在“冰上丝路”中呈现文化融构，则较少有系统性研究。换言之，儒学经典如何进入北欧新教神学视野而被译介、诠释、传播与融构成为中欧哲学交流史探源研究以及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新型外译理论的关键性命题。^②作为北欧儒学发展的典型镜像，芬兰文语境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参照。为此，本研究聚焦“冰上丝绸之路”背景下芬兰文儒学勃兴与发展的百年历史脉络，梳理芬兰传教士汉学家儒学研究的诠释路径与策略，以期透射出儒学在冰上丝路上传播与研究的内在特质与规律，进而评估其对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拓新中国哲学外译理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镜鉴。^③由此，本研究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北欧汉学勃兴的冰上丝路历史背景，芬兰儒学奠基及早期传教士译介，当代芬兰儒学兴盛与新发展，芬兰儒学百年文化融构对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拓新中国哲学传播理论的现实启示与镜鉴价值。

一、重识冰上丝绸之路：北欧汉学勃兴的历史背景

冰上丝路是“一带一路”文化倡议的重要延伸，也是当前建设中国与北欧国家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一项国家合作机制设想，对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斯堪的纳维亚世界与环北冰洋流域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文化战略价值。^④虽然“冰上丝绸之路”是近些年来国家新提出的国际合作概念，其宗旨在于提升中国与北欧国家的人文互动与核心价值观交流，但并非意味着该概念缺乏相应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恰恰相反，冰上丝路的实际内容（涵盖丝绸、瓷器、毛织品、茶叶等贸易）早已有之，并伴随北欧汉学兴起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然而，以往研究较少有对该概念进行内涵探索及相应的文化溯源。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大拓展空间。笔者认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18世纪初期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创建和发展历程密切相关，这构成了芬兰文儒学勃兴的重要历史背景与文化条件。因此，以瑞典东印度公司发展史为线索，我们首先考察早期冰上丝路形成过程中瑞典所开辟的探寻中国的远洋航线，留意其对中国与

-
- ① 见方豪著、郑阿财编：《中西交通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81—202页；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4—71页；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第21—26页；马玉凤：《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193—203页。
- ② 目前笔者正聚合芬兰科学院、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冰岛大学等相关北欧哲学家团队对北欧的儒佛道哲学进行综合性开拓。其中，笔者“冰上丝绸之路”团队专家成员罗明嘉（Miikka Ruokanen）教授与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教授为推进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原始史料与研究建议。另外，尼基拉夫妇（Kaisa Nikkilä & Pertti Nikkila）亦在病重中为笔者项目的研究寄送了多种重要芬兰文文献史料。在此特表感谢。
- ③ 本文是首次对百年来芬兰文儒学发展源流及其传播特质开展的系统梳理与专题研究。相关的前人研究较为零星和单薄，数据也相对滞后。目前，零散地涉及芬兰儒学或文化传播中“中国形象”建构的研究者主要有杨富雷教授、李颖博士及尼基拉夫妇等人。其中，杨富雷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传教士入华以及早期中国形象在北欧的建构，李颖则侧重比较文学与翻译学角度的研究，而尼基拉夫妇则强调儒学与神学（特别是王为义思想）的对话。这三种倾向均对笔者从“冰上丝绸之路”视角系统性梳理百年芬兰文儒学的勃兴与发展并进行独立的系统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关于这三种代表性路径的典型研究，参见杨富雷：《北欧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尚光一译，《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第196—203页；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Kaisa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Helsinki: Yliopistopaino, 2000.
- ④ “冰上丝绸之路”起初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补充，最先体现于《“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17）等政府文件。随后，国务院新闻办于2018年初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冰上丝路”作为国家制订的北极政策逐渐成形。关于“冰上丝路”作为我国北极发展规划的新概念的提出，参见赵万里：《“冰上丝绸之路”合作意义、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东北亚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第5—14页；杨剑：《〈中国的北极政策〉解读》，《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3期，第1—11页；基齐金娜、曲悠扬：《“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冰上丝绸之路”》，《黑河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1—3页；李振福、韩春美、梁珊珊、陈霄：《北极航线到“冰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演进》，《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78—89页。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前期阶段性研究，亦见高源：《北极走廊上的比较文学：希约利与明清古典文学典籍的冰岛文译介》，《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203—212页。

北欧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特殊价值与历史贡献。

1731年，步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英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之后尘，瑞典东印度公司于当时北欧贸易中心哥德堡（Göteborg）创建。^①由此，瑞典东印度公司开启了北欧国家向中国及远东的远洋历史。瑞典的航线虽然晚起，但很快跻身于列强的远东贸易国际竞争之列，向东方运输了北欧的银器、铜铁、毛皮、纺织品、蜂蜜、葡萄酒等商品。^②依据贸易特许令及相应的航海日志、日记等记录，我们可将瑞典东印度公司研究分为兴盛（1731—1746）、发展（1746—1766）以及末期（1766—1813）这三个阶段。^③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前两个阶段共向远东派出了61艘船，进行了132次巡航；其中驶向中国广州的多达55艘计124次巡航，另外6条则同时驶向印度苏拉特（Surat）与中国。^④由此可见，瑞典早期主要的远东贸易对象便是中国，而航行目标聚焦广州，某种程度上调整了以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侧重福建与肇庆航路的重心。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形成与快速发展，使其拓展了15、16世纪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中欧文化交流的格局，形成了“冰上丝绸之路”的早期雏形。

瑞典向中国的首航可溯源至1732年3月7日，时值清朝雍正十年，随后形成贸易惯例，正如《清朝文献通考》所载：“瑞国在西北海中……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绝。”^⑤关于首航，苏格兰商人康贝尔（Colin Campbell, 1686—1757）保留了详细的日记（被誉为“世界首部中国贸易手册”）^⑥，成为研究中国与北欧早期航海贸易的宝贵史料。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清朝文献通考》《粤海关志》等也提供了重要的印证文献。^⑦据康贝尔日记称，瑞典首航由“弗莱德瑞克国王号（Fredericus Rex Sueciae）”完成，船长为荷兰海军上尉特洛尔（Georg H. Trolle, 1680—1765），康贝尔本人担任大班。^⑧船队所经路线主要是挪威的洪堡逊德、英吉利海峡（3月14日）、西班牙卡迪兹（4月9日）、好望角（6月23日）、巽他海峡（8月10日）、广州（9月19日）；在广州停留4个月后，船队于1733年1月返航，经巽他海峡，9月7日返回哥德堡。^⑨然而，瑞典对中国远洋航线的开辟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但首航并不顺利。首先，船长与大班关系不睦。据康贝尔描述，船长特洛尔是性情残暴、寡廉鲜耻的酒鬼，康贝尔对其甚为不满，扬言“我从来没有跟这样一群愚蠢而疯狂的人一起在船上生活过，他们对自己的职责毫无概念，也不遵守誓言，不遵守公司或者国王陛下下达的听从我命令的指

① Christian Koninckx, “The Maritime Routes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Its First and Second Charter (1731–1766),”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6, no. 1, 1978, pp. 36–65.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298《四夷考》6：“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黑铅、粗绒、洋酒、葡萄干诸物来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见何爱民：《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研究（1731—181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40页。

③ 瑞典东印度公司发展史不同时间段的界定，学界尚无定论。为研究之便，笔者参照科宁科斯（C. Koninckx）的划分法（见Koninckx, “The Maritime Routes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Its First and Second Charter (1731–1766),” pp. 36–37.）。其他划分依据，见何爱民：《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研究（1731—1813）》，第7—16页。

④ 见Koninckx, “The Maritime Routes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Its First and Second Charter (1731–1766),” pp. 42–43.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298《四夷考》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73—7474页。同见何爱民：《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研究（1731—1813）》，第20页。

⑥ Bengt Johansson, “The Diary of Colin Campbell: The World’s First China Trade Handbook,” in Bengt Johansson eds.,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Trade*, Hong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同见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学术研究》2011年第6期，第120页。

⑦ 关于这些史料，参见何爱民：《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研究（1731—1813）》，第8页。

⑧ Colin Campbell, *A Passage to China: Colin Campbell’s Diary of the First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Expedition to Canton, 1732–33*, Göteborg: Royal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Göteborg, 1996, pp. 11–12, 84–89.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的“康贝尔日记”在“国王号”返航瑞典过程中，遭到荷兰人的扣留，为防止航海日记落入敌手，康贝尔销毁了其日记。返回哥德堡后，康贝尔凭借记忆重写了日记。虽然整体上可信，但细节之精确性受损。“康贝尔日记”长期不为人所知，直至1987年出现于纽约古物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参见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第121页。

⑨ 见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第120–121页。同见何爱民：《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研究（1731—1813）》，第21—22页。

示。”^①其次，瑞典首航贸易与英、法、荷等国商人存在激烈的竞争。瑞典公司在航行中国过程中不断更换国旗，一方面为了避税，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寻求他国商队的庇护。对华贸易中，康贝尔发现青花瓷很少，主要是被英法商人抢走了，剩下的才轮到瑞典，利润微薄。而且，瑞典商船返航途中，也遭到荷兰的洗劫。^②再次，康贝尔与广州粤海关官员以及行商关系也较紧张，康贝尔向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揭发粤海关官员索要“规礼”和“缴送”，三番五次告状，得罪了总督衙门与通事，使瑞典公司贸易受阻。^③首航不顺既有康贝尔锱铢计较、出尔反尔等个人性格因素所致，亦因清朝粤海关盘剥与勒索的制度痼疾。然而，瑞典向中国的首航意义重大，其以“丝绸”为核心，增进了后续“中国-北欧”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同时康贝尔所带回国的清朝家具、人参、朱砂、桌布、青花瓷、藤索、珍珠、棉织品等器具实物^④，拓展了北欧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从器物层面推进了北欧汉学的兴起。

瑞典东印度公司所开辟的以丝绸与银器为主要形式的最初“冰上丝路”贸易，成为北欧汉学家与传教士探寻中国的重要载体。沿着该航线，形成了多轮探险家入华浪潮。首先是以图尔库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 of Åbo, 1640—1828）为中心的新兴学院派汉学家群体。这以芬兰从瑞典管辖中独立以及芬兰语言系统化为背景。以芬兰图尔库皇家学院早期赴华调研的瑞纽斯（Israel Reinius）为例，其于1746年2月乘坐瑞典东印度公司轮船驶往广州，沿途对中欧银器丝绸贸易情况作了记录，之后返回哥德堡形成了哥特体瑞典文《旅华辑录》，成为芬兰汉学家对清朝中国的最早旅行记录。^⑤其次是以播道会为载体的传教士群体。19世纪瑞典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符恺励（Erik Folke, 1862—1939）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符恺励于1887年创建了瑞典中华播道会（Svenska Missionen i Kina），亦称“瑞华会”，其以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份为轴心，对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学校教育与教会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⑥同时，符恺励也译出了瑞典最早的《道德经》（*Boken om Tao och Te*），成为引介中国“道”文化的先行者。^⑦也正是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冰上丝路”航线，芬兰播道会与路德信义会的一批早期传教士如美娅（Agnes Meijer, 1861—1897）、喜渥恩（Henrik E. Sihvonen, 1873—1967）、王为义（Juho Toivo Koskikallio, 1889—1967）等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相继来华，形成了以湖南湘西等为据点的芬兰传教士在华宣教的大体局面。此外，挪威、丹麦、冰岛等国神学家也多藉瑞典东印度公司航线“丝路”入华，纷纷成立播道会与信义会，构成了近代北欧与中国文化相遇的盛景。

由此，北欧神学家、汉学家与探险家伴随着瑞典东印度公司早期开辟的“丝路”形成多个世纪的入华播道浪潮，对“中国-北欧”哲学与人文互动产生深刻影响。以“丝绸与银器”贸易为主导^⑧、由哥德堡到广州再进入山西、湖南、江西等内陆传播路径的冰上航线，改变了以往“海上丝路”西欧国家航

① Campbell, *A Passage to China*, p. 232. 同见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第122页。

② 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第128页。同见何爱民：《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研究（1731—1813）》，第19—20页。

③ 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第125—126页。

④ 关于瑞典首航带回北欧的具体实物，见江滢河：《〈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第128页。

⑤ 笔者收藏有最早的瑞纽斯（1729—1797）提交给皇家科学院论文的印刷体扫描版，共56页，时间记录为1749年12月12日。文稿呈暗黄色，哥特体瑞典文，字迹清晰，排版工整。瑞纽斯的序言扼要，内文关于其哥德堡与广州往返的见闻翔实，是难得的中芬文化交流史探源的一手研究史料。笔者将另文对此珍稀原始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关于图尔库皇家学院暨早期芬兰汉学家入华背景，亦可参阅笔者前期阶段性研究：高源：《百年芬兰文老学译介源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09—116页。

⑥ 关于创始人符恺励及“瑞华会”的历史背景，参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19111116/http://www.eom.nu/historik.aspx>，2023年5月23日。

⑦ Erik Folke, “Tao-Te-King,” in Nathan Söderblom, eds., *Främmande Religionsurkunder i Urval och Öfversättning*, vol. III: *Ur Kinas och Japans, Naturfolkens Samt de Döda Kulturreligionernas Heliga ord och Texter*, Stockholm: Hugo Gebers Förlag, 1907, pp. 45–76. 关于瑞典文道学译译背景及其与芬兰文诠释视角的比较性研究，参见笔者前期阶段性探索：高源：《中国道家经典最早传入北欧的诠释路径及其当代理论镜鉴》，《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5期，第121—128页。

⑧ 关于中国与北欧的早期贸易背景及其不同于欧陆的文化汇通格局，参见 Rikard Warlenius, *Iron for Tea: The Trade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as a Cross-Continental Case Study of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2011.

队侧重福建、肇庆等沿海城市的贸易格局，形成以北欧路德教义传播为特色的新型文化交互模式。这对重新理解中欧哲学与文化交流史图式的多元性、差异性、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冰上丝路”暨北欧汉学勃兴的整体背景下，处于“欧陆-北欧-俄国”三方宗教哲学交锋的芬兰开启了探寻东方的历史进程。其中，芬兰儒学的勃兴及发展，构成“中国-北欧”传统文化互动的一个缩影，对深度理解北欧中国哲学发展模式、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新型儒学外译策略与方法，具有重要价值和理论启示。

二、芬兰儒学奠基及早期传教士译介：科和宁与王为义

借着瑞典东印度公司所开拓的入华“冰上丝路”贸易航线，芬兰信义会的科和宁（Kalle E. Korhonen, 1885-1963）与王为义两位神父于20世纪初来华并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汉学传译工作。^① 两者的教育背景、神学主张以及来华经历颇为相似。两者均译介了较多的中国哲学经典，为20世纪芬兰儒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就目前史料看，科和宁1921年于赫尔辛基出版的《四书解义》（*Kunfgutsen suuri oppi*）乃是首次进入芬兰语视野的儒学经典。^② 其内容主要是对孔子生平、流派以及儒家思想的介绍，同时也涉及了《大学》部分内容的译介。该著将孔学及儒家思想置于中国儒佛道三教宗教观视野下进行梳理，是难得的最早的芬兰文对东方儒学思想及宗教价值精神较为系统的研究。不仅如此，科和宁也结合自身在华经历，出版了《在中国的事工》（*Lähetysaarnajana Kiinassa*, 1925）、《中国风暴中心》（*Kuohuan Kiinan keskellä*, 1928）等多种芬兰文纪实性著作。^③ 同时，其回顾性报告《在中国的25年：芬兰播道会（1902—1927）》^④ 成为研究中芬早期交往史的重要史料。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科和宁的译介背景及这部最早的芬兰文儒学奠基之作。

科和宁1885年出生于新教农民家庭。受首位芬兰信义会来华传教士喜渥恩的影响，科和宁产生了探寻东方的热情。科和宁于1910年入华，大部分时间在湖南开展工作。1917年科和宁回国，在赫尔辛基大学完成哲学硕士学位（1921）。这期间，科和宁搜集了欧洲诸多儒学译本，完成了《四书解义》（1920）。之后，科和宁重返中国，成为芬兰信义会在华以及路德教会的重要领袖。值得关注的是，科和宁此时主编的《中国风暴中心》，纳入了不少同期传教士的见闻，成为研究义和团动荡时局及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命运的重要史料。^⑤ 1935年科和宁最终离开中国，回国主编《禧年杂志》，直至1963年病逝。^⑥

① 芬兰信义会早在19世纪中叶便已成立，最初宣教目标是非洲。随着马吉宁（A. Mäkinen, 1857—1936）与美椰（A. J. Meijer, 1861—1897）等神学家开创播道会运动，芬兰的宣教逐渐指向了中国。喜渥恩、科和宁、王为义等神父乃是其中最重要的先行者。芬兰信义会的产生与发展与瑞典、英国的普世神学运动密切相关。关于芬兰信义会及其来华传教士，参见 Antti Mäkinen, “Ebenezer” eli Lyhyt silmäys Suomen Wapaan Kiinan Lähetysten Syntyyn ja Kehitykseen, Suomen Wapaan Kiinan Lähetysten kustannuksella, 1906; 喜渥恩：《改教四百年纪》，汉口：中华信义会书包部，1929年。

② Kalle Korhonen, *Kunfgutsen Suuri Oppi, Johdatus Kungfutselaiseen Elämäkatsomukseen*, Helsinki: Otava, 1921. 原书现存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亚非研究以及哲学研究专柜。鉴于科和宁的重要性，中芬汉学家对《四书解义》以及科和宁的贡献有不少论述，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李颖博士与尼基拉夫妇。李颖博士曾对《四书解义》及其内容结构有过简单介绍，但尚未深入具体文本，对科和宁所涉书目涵盖的当时国际汉学视野未来得及充分发掘。这为我们从比较哲学与历史文献学角度系统考察科和宁汉学贡献以及早期芬兰儒学的发展形态，留下了广阔空间。关于科和宁这部儒学著作的相关阐述，参见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2013年；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2000.

③ Kalle Korhonen, *Lähetysaarnajana Kiinassa*, JUVA: WSOY, 1925; Kalle Korhonen eds., *Kuohuan Kiinan Keskellä*, JUVA: WSOY, 1928.

④ Kalle Korhonen, “25 Vuotta Kiinassa: Suomen Lähetysseuran Työtä 1902-1927,” *Kansan Kuvalehti*, no. 29, 22 July, 1927. 见芬兰国家图书馆（kansalliskirjasto）所藏：<https://digi.kansalliskirjasto.fi/aikakausi/binding/891415? page=8>, 2023年5月23日。

⑤ 据科和宁透露，时任播道会副主席的哈努·哈迪（Hannu Haahti, 1865—1935）于1914年来华视察，对慕道友要求甚为严格，特别是要求所有入教会者均须具备阅读圣经的能力。科和宁对此并不以为然。关于科和宁所揭示北欧传教士间宣教路线分歧情况，参见 Kalle Korhonen eds., *Kuohuan Kiinan Keskellä*, JUVA: WSOY, 1928, p. 26.

⑥ 科和宁入华历史背景，见奥塔凡印书馆之《时代》（*Aikalaiskirja*）电子资源：runeberg.org/kuka/1954/0391.html, 2023年5月23日。

《四书解义》是科和宁早期的重要代表作，完成于1920年。全书325页，主要内容有7个部分。除《前言》与《参考文献》外，正文共有5章，依次为《孔子生平》(*Kungfutsen elämä*)、《儒学特质》(*Kungfutselaisuuden yleisiä piirteitä*)、《儒家作为宗教》(*Kungfutselaisuus uskontona*)、《大学》(*Suuri Oppi*)、《注释与其他》(*Huomautuksia ja lisäyksiä*)。我们将这些章节的主要内容梳理如下：首章《孔子生平》中，科和宁介绍了孔子时代的中国、孔子生平、性格特征及家世等内容；次章《儒学思想特质》介绍了儒学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教育及制度、儒家德性观及伦理学；中章《儒家作为宗教》则论述了中国三大宗教、古代宗教形态、上帝观的起源、孔子崇拜的历史发展、孔庙祭祀仪式等内容；第四章《大学》则部分地翻译了《大学》，同时将其视作儒家世界观与生命观的“纲要”并进行了细致介绍，并介绍了中国人儒学思想及礼学的实质；尾章《注释及其他》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概况、省份地名、评注、参考目录以及索引。^① 值得关注的是，科和宁在全书最后提供了当时英、德、法、美、挪、芬等语境中最主要的汉学参考书目，基本囊括了欧陆、英美与北欧大部分的中国哲学与宗教学研究成果。这为我们了解北欧儒学的形成以及欧陆汉学由南向北的推进脉络，提供了宝贵的原始史料。

可以看到，科和宁对儒学的研究兼具史学、翻译学、文献学、比较哲学以及系统神学的综合特质，视野开阔且文献翔实。特别是科和宁将儒学释作一种宗教的敏锐性洞察，在当时具有理论前瞻性。同时，除了掌握欧陆儒学多种原始研究的文献优势外，科和宁也及时纳入了芬兰播道会与信义会的最新汉学动态。其中，芬兰播道会创始神学家马吉宁（Antti Mäkinen）的《中国人及其需要》（1906）、索布朗姆（Hannes Sjöblom）的《中国与在华事工：关于中国的三篇论文》（1907）以及沃芮宁（Anton Vuorinen）的《旅华观察》（1908）被置于较重要的位置。^② 由此，欧陆儒学以及芬兰早期传教士旅华见闻材料，成为科和宁开拓芬兰儒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

对于译文的选择，科和宁更加青睐《大学》。在他看来，这部经典乃是儒学价值体系的纲要，为西方读者把握儒学精神提供了便利。这种观察与罗明坚等早期意大利耶稣会士选取《大学》首段进行拉丁文译介的缘由颇为相近。倘若说罗明坚1593年所译《大学》首段是“海上丝路”背景下最早进入欧洲社会视野的拉丁文儒学文本的话，科和宁的《大学》则是“冰上丝路”上芬兰儒经译介的开辟之作。然而，科和宁的译介主要是基于欧洲主流语种的译介与评点成果。考其源流，笔者发现如下英、法、拉丁等语种译本构成了科和宁《大学》参照的版本基础：（1）英国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英文版“中国古典学”系列（1865—1893）^③；（2）法国顾赛芬（Couvreur Séraphin, 1835—1919）1895年版的“法文-拉丁文”对照版《四书》(*Les Quatre Livres*)^④；（3）德国传教士安保罗（Paul Kranz, 1866—1920）从古文到白话文翻译的《四书本义官话》。^⑤ 同时，科和宁也参考了美国林亨理（Henry M. Woods）的《四书解义适今》。^⑥ 虽然理雅各英译本以及顾赛芬的法译本也涵盖《大学》的部分中文内容，但这些间接中文材料并非科和宁参译的直接文本。换言之，科和宁关于儒学宗教性的解读更多地依赖于既往法、德、英等欧洲语种译本（其中，顾赛芬的“法文-拉丁文”对照本占据核心位置）。^⑦ 这种转译方式乃是早期北欧汉学发展的典型路径。

与科和宁几乎同时，王为义也做着类似的儒经翻译工作。然而，同属芬兰信义会传教士，王为义与

① Korhonen, *Kungfutsen Suuri Oppi, Johdatus Kungfutselaiseen Elämäntekemiseen*, p. XIX. 关于科和宁及其《四书解义》的介绍，参见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第32—33页。

② Antti Mäkinen, *Kiinan Kansa ja sen Tarpeet*, Helsinki: Suomen Vapaan Kiinan Lähetys, 1906; Hannes Sjöblom, *Kiina ja Lähetystyö Kiinassa: Kolme Esitelmää Kiinasta*, Helsinki: Suomen Lähetysseura, 1907; Anton Vuorinen, *Matkahavainnoita Kiinasta*, Helsinki: Suomen Lähetysseura, 1908.

③ 关于理雅各“中国古典学”系列，见 <https://www.sacred-texts.com/cfu/index.htm>, 2023年5月23日。

④ Couvreur Séraphin, *Les Quatre Livres: Avec un Commentaire Abrege en Chinois, Une Double Traduction en Francais et en Latin et un Vocabulaire des Lettres et des Noms Propres*, Toulouse: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95.

⑤ 见《前言》(Alkulause),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51906/51906-0.txt>, 2023年5月23日。

⑥ 林亨理 (Henry M. Woods): 《四书解义适今》，上海：广学会，1910年。关于这些版本信息源，科和宁在其《前言》中也有较详细的阐述。

⑦ 科和宁在《前言》中对其语言老师奥·曼宁恩 (O. Manninen) 所作的芬兰文与顾赛芬之法译本的审校，给予了特别的感谢。由此可知，顾赛芬的法译本是科和宁芬译的最主要底本之一。

科和宁的儒学观及其译介途径是否相同？这对于揭示芬兰早期儒学诠释方式与发展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沿着科和宁译本，我们进一步探察王为义的译介背景及其主要儒学贡献。

王为义来华略晚于科和宁，但其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译介与研究展示出更为广阔的图景。1889年，王为义生于芬兰南部的瑞典裔农民家庭，1913年进入芬兰信义会，1920年受信义会委派，到湖南与喜渥恩、科和宁等汇合并从事教育、医疗、慈善、戒烟、译介等工作。与科和宁日志观察一致，王为义与妻子英格丽（Inkeri Haahiti, 1892—1959）以第一视角写了报告与日志，反映了20世纪初在湖南爆发的民粹主义及反对基督教的宗教运动。^① 同期，除了《道德经》《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的译介外，王为义也涉猎了《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文献，留下了大量芬兰译文及铅印手稿。此外，另有少部分译文如《大学》《中庸》《中庸之道》《墨子》《新佛教思潮》《中国文化运动缘起》等手稿也以摘录方式发表。^② 王为义对于儒佛道三教经典的翻译、评注与研究一直持续到1947年回国。离别之际，王为义于上海《中国新闻报》（*China Newsletter*）发表《我翻译中国古典学的经历》。^③

可以看到，王为义与科和宁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神学立场以及来华阅历均体现出较大相似性，但并非意味着两者儒学观也全然相同。恰恰相反，王为义体现了如下迥然的儒学见解与诠释路径。

首先，王为义淡化儒家的宗教性，而强调儒学的伦理性与道德性。一个典型的译法乃是将儒家的“仁”诠释为“爱”。作为儒家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展示了古代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王为义试图从“伦理”层面来解释“仁”的内涵。在他看来，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具有较多的相似性。^④ 这种比附的目的，在于凸显基督教之“爱”（*caritas*）及伦理规范的普世性。与此相反，科和宁则强调儒学的宗教性（见其第三章《儒家作为宗教》），他将“仁义礼智信”视为“五常”，并结合“王道”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宗法之“礼教”纳入“天理”进行解读。在科和宁看来，“三纲五常”与耶稣门徒雅各（*apostoli Jaakobin*）所揭示的“爱的法则”甚为相似：儒家所谓的“天理”之“仁”与基督教神学之“爱”共同揭示了“本体”意义上的道德律，这种道德律并非局限于形下之伦理学层面。^⑤

其次，王为义强调儒学的“成圣”指向了真实的神圣（天人合一），而不仅仅是道德或人格层面上的完善。王为义将儒学致良知之“心”视为基督教之“上帝”居住的“圣殿”，而上帝在心中的浇灌，恰恰是一个人成圣之途的开启；由此，理学与心学所谓的“天理之心”乃恰是基督教之“良心”（基督本体居住之心）在东方的显映。^⑥ 然而，这种成圣观与科和宁的观察相反。在科和宁看来，儒家之“成圣”并非神学意义上的神圣化，更不能将其等同于基督教观念中的“完善”或“成神”状态；儒家所谓的“成圣”顶多是道德层面的“善”或“智”，而非神格意义上的完善。^⑦

此外，与科和宁基于欧洲主流儒学成果的转译不同，王为义则主要基于在华搜集的中文原典。除了《大学》《中庸》等少部分译稿提前发表外^⑧，王为义大部分译稿（《孟子》《论语》等）都是回国后才

① 这些日志主要包括《匪徒与和平使者》《时代风暴》《英格丽日记》等。见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2000, pp. 21–22.

② 关于这些片段式译文与研究的发表列单，见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p. 196–199.

③ T. Koskikallio, “My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 *China Newsletter*, Shanghai, 1947, April–May. 同见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 22.

④ Kaisa Nikkilä, “Toivo Koskikallio’s Conception about Love in Chinese Philosophic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Christian Love in Chinese Context,” *Theology & Life*, vol. 32, 2009, pp. 276–277.

⑤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p. 70–71.

⑥ Toivo Koskikallio, *Johanneksen Logos ja Lao Tze'n Tao*, Pastoraaliväitöskirja, 1935, pp. 38–42; Kaisa Nikkilä, “Toivo Koskikallio, Past LTS President,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Theology & Life*, vol. 28, 2005, pp. 99–100.

⑦ Korhonen, *Kungfutsen Suuri Oppi. Johdatus Kungfutselaiseen Elämäntutkimukseen*, p. 105;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 72.

⑧ T. Koskikallio, “Suuri Oppi,”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 vol. I, no. 6, 1923; T. Koskikallio, “Kultainen Keskitie,”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 vol. I, no. 6, 1923. 同见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p. 197–198.

陆续面世。因此，科和宁与王为义展现了转译与直译这两种不同的诠释方式，成为儒学早期进入芬兰文语境的主要途径。

三、当代芬兰儒学的兴盛与新发展：从以神释儒到回归本义

基于上半叶在华完成的中国哲学典籍的译稿与研究，王为义回国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成果，典型的有《老子》（1950）、《孔夫子：论语》（1958）、《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宗教观》（1958）、《孟子：学理》（1959）、《金佛》（1961）、《匪徒与和平使者》（1962）、《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神学》（1963）、《墨子》（1964）、《中国古代宗教》（1965）、《杨子》（1965）、《王阳明》（1965）等著作。^① 其中，译著《孔夫子：论语》《孟子：学理》在芬兰儒学研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分量。同时，王为义也校订出版了妻子英格丽在华通信与纪实的日志《英格丽日记》（1960）^②，展现了民国初期动荡战争时局与基督教命途多舛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其他译学家如聂米宁（Pertti Nieminen）等也主编了一些中国哲学代表作如《中庸：中国智慧选集》等。^③ 王为义与聂米宁等译稿的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芬兰儒学的主要发展形式。以王为义及其《论语》《孟子》等译著为代表，我们将深入考察这一时期儒学的译介特点与诠释策略。

《孔夫子：论语》（*Kung Fu-Tse: Keskustelut*）最初译介于1930年12月，由两部分构成：（1）《孔夫子》（*Kung Fu-Tse*）；（2）《论语》（*Keskustelut*）。其中，《孔夫子》原存的是铅印本兼具铅笔修订字迹，共125页，而《论语》则是墨水手迹239页，另附25页注释。^④ 1958年，王为义将《孔夫子》纳入《论语》的《导言》，整体出版于赫尔辛基的维尔纳出版社。^⑤ 在《孔夫子》中，王为义用较长篇幅介绍了孔子生平、春秋历史、诸子流派、四书背景以及孔子的哲学思想，涵盖《孔子其人》（*Kung Tse Ihmisenä*）、《孔子的世界观》（*Kung Tsen Maailman-Katsomus*）、《孔子的哲学》（*Kung Tsen Filosofia*）三部分内容。^⑥ 而在《论语》中，王为义则按《学而》《为政》《八佾》等原文篇章顺序进行了直译。王为义译文遵循原典本义，但亦有不少灵活处理，体现出神学视角下的儒学观念诠释，如以下案例（见表1）：

表1 王为义《孔夫子：论语》芬译文及“芬—汉”文献比较

篇名	芬兰译文	“芬—汉”回译 ^⑦	原典中文 ^⑧
《学而》 (<i>Opiskelusta</i>)	Todella jalo kääntää huomionsa oman sisäisen olemuksensa tutkimiseen. Kun sisäinen olemus on lujittunut, syntyvät hyveet. Eikö kaiken hyveellisen rakkaustoiminnan perustana ole vanhempain kunnioittaminen ja veljellinen rakkaus? (<i>Opiskelusta</i> , ii)	君子转向其内在本质，当内在坚固，美德则生出。岂非爱之所有美德，基于对父母与兄弟之爱的尊重吗？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为政》 (<i>Hallitustoimista</i>)	Mestari lausui: Ken uhraa hengille, jotka eivät hänelle kuulu, on liehakoitsija. - Joka näkee oikean eikä kuitenkaan sitä tee, on pelkuri. (<i>Hallitustoimista</i> , xxiv.)	夫子说：任何祭祀不属于其自己的精灵的人，是谄媚者。任何明白正义而不作为的，是懦夫。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八佾》 (<i>Juhlamoista</i>)	Mestari vastasi: Ellen ole läsnä uhritoimituksessa, tuntuu kuin uhria ei olisi laisinkaan suoritettu...Mestari vastasi: ...Sillä, joka on tehnyt syntiä Taivasta vastaan, ei ole missään paikkaa rukoilla. (<i>Juhlamoista</i> , xii - xiii.)	夫子说：除非我来亲自祭祀，否则就会感觉没有祭祀过一样…… 夫子答：谁如果得罪了天，则无地而祷。	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① 关于这些著作的列表，参见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p. 190–202.

②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 191.

③ Pertti Nieminen, Kristiina Kivivuori and Tuomas Anhava eds., *Keskite: Valikoima Kiinalaista Viisautta*, Helsinki: Tammi, 1956.

④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 195.

⑤ T. Koskikallio, *Kung Fu-Tse Keskustelut (Luen-Y)*, Porvoo·Helsinki: Werner Söderström Osakeyhtiö/WSOY, 1958.

⑥ Koskikallio, *Kung Fu-Tse Keskustelut (Luen-Y)*, pp. 7–45.

⑦ 若非特别说明，本文中的芬兰文中译（直译），均为笔者所译。

⑧ 洪修平主编：《儒佛道哲学名著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19页。

在《学而》案例中，王为义基本依照原文进行直译，但亦有不少细微地方的改动，比如将“道”释为“德”（hyveet/virtues），将“仁”释为“爱”（rakkaus/love）。这些微小改动，展现出王为义更加强调《论语》伦理层面的教化。在《为政》案例中，王为义将“鬼”释为“灵”（henki/spirits），使之与基督教三一神学之“灵”（spirit）产生了沟通。在《八佾》案例中，王为义用基督教之“罪”（synti/sin）来解释孔子所说的“获罪”，但同时保留了儒家之“天”（taivas/heaven）的概念。这三个案例，透射出王为义译文中的两个倾向：其一，遵循《论语》的表述结构，将其视作伦理之书；其二，将基督教“罪”“爱”及“灵”等神学观念渗入儒学诠释，产生观念引申。这两种倾向也同时反映于其同期译介的《孟子：学理》（Mung Tse: Opetukset）手稿中。

王为义的《孟子》译稿形成于1931年8月。初稿为蓝色墨迹，共554页，分为两卷，后于1959年出版。^①与《论语》手稿相似，《孟子》译文也分为两部分：一为《孟子》（Mung Tse），另者为《学理》（Opetukset）。其中，《孟子》作为“导言”附于《学理》之前。《导言》（《孟子》）主要介绍了孟子生平、历史背景、孔孟关系、学派源流、孟学传承及时代影响等内容，而《学理》则遵照原典《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的传统顺序展开。在具体译介中，王为义亦承袭了其《论语》的译法，将“仁”释为“爱”。其中，典型的案例便是《尽心下》中所言的“不忍之忍（仁）”，王为义用“rakkaus/love”（爱）来诠释“仁”，用“vanhurskaus/righteousness”诠释“义”。^②众所周知，“爱”与“义”是基督教伦理神学中的概念，将其比附孔孟之“仁”“义”，展示了王为义以神释儒的视角。

与王为义相应，聂米宁等汉学家也在同期发表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译作。聂米宁1929年生于瓦萨，在唐宋诗词、明清小说以及经史子集等领域造诣深厚，曾先后译出《老子》以及李清照、陶渊明、苏东坡等诗集。^③而其1956年编译的《中庸：中国智慧选集》则收录了“四书”以及《尚书》《诗经》《荀子》《墨子》《老子》《庄子》《楚辞》《商子》等典籍译文。^④这些多是节译，紧接着于1957、1969年再版。聂米宁也采取了“以神释儒”的策略，呈现出儒耶比较的综合立场。然而，聂米宁的译作只是概览式介绍，虽然其精确性与社会影响力无法与王为义相比，但为社会读者了解中国儒学及其基本精神，提供了另一种方便途径。

进入新世纪，一方面儒学选译工作依然持续，另一方面对以往儒学译介及“以神释儒”的反思性工作也出现了系统研究著作。在儒学编译方面，王为义亲属约翰（Jouko Koskikallio）与佩蒂（Petteri Koskilallio）等对王为义生前手稿《诗经》与《列子》进行了整理与出版。^⑤同时，芬兰汉学家高玉麟（Jyrki Kallio）也逐渐改变以往传教士以神释儒的译法，代之以还原儒学本义之精神来重新译介《论语》《孟子》，同时也直契原典译出了《古文观止（上中下）》《儒学之经》等更为全面和精确的成果，推动了当前儒学研究，并呈现出最新的译介动态。^⑥

从儒学研究著作来看，世纪之交的汉学研究中出现了从以神释儒到还原本义的重要诠释策略转型。典型代表乃是尼基拉夫妇。这种策略转型，主要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从儒耶比较视角来观照儒学

① T. Koskikallio, *Mung Tse: Opetukset*, Porvoo·Helsinki: Werner Söderström Osakeyhtiö/WSOY, 1959.

② “Mung Tse Lausui: Kaikilla ihmisillä on jotain, mitä he eivät voi säälittä katsella. Kun tämä tunne yleistetään kaikkia käsittäväksi, silloin on saavutettu rakkaus. Kaikilla ihmisillä on jotain, mitä he eivät voi tehdä. Kun tämä tunne yleistetään, niin on saavutettu vanhurskaus.” (Koskikallio, *Mung Tse*, p. 231) 《尽心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见洪修平主编：《儒佛道哲学名著选编》，第88页）

③ Pertti Nieminen, *Laotse: Tao te ching*, Helsinki: Tammi, 1986; Pertti Nieminen, *T'ao, Yüan-ming: Viipyilevät Pilvet*, Helsinki: Otava, 1976; Pertti Nieminen, *Li Yü & Li Ch'ing-chao: Pudonneiden Kukkien Puna: Li Yün ja Li Ch'ing-chaon Runot*, Helsinki: Otava, 1988; Pertti Nieminen, *Su, Tung-p'o: Sateen Jälkeen: Su Tung-p'on Laulurunoutta*, Helsinki: Otava, 1998.

④ 关于《中庸：中国智慧选集》编译内容的介绍，参见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第60—61页。

⑤ Toivo Koskikallio, *Shih King: Laulujen Kirja*, eds. Jouko Koskikallio, Helsinki: Kadetintie, 2001; Toivo Koskikallio, *Liezi: Salaisuusien tien kulkija*, eds. Jouko Koskikallio and Petteri Koskilallio, Helsinki: Yliopistopaino Oy, 2008.

⑥ Jyrki Kallio, *Jadekasvot: Valittuja Tarinoita Kiinan Muinaisajoilta*, Helsinki: Gaudeamus, 2005; *Jadelähde: Valittuja Kirjoituksia Kiinan Keskiäjalta*, Helsinki: Gaudeamus, 2007; *Jadepeili: Valittuja Kirjoituksia Keisarillisen Kiinan Kulta-ajoilta*, Helsinki: Gaudeamus, 2008; *Mestari Kongin Keskustelut*, Helsinki: Gaudeamus, 2014; *Mengzi*, Helsinki: Gaudeamus, 2020; *Avain Kungfutselaisuuteen*, Helsinki: Gaudeamus, 2022.

义理，形成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隐秘智慧》(2000)^① 等比较宗教学著作。其出发点乃是以王为义神学为视角，展现20世纪芬兰儒学的研究进路；另一方面，则契入先秦诸子与孔孟原著进行概念术语的溯源，对儒学核心概念及伦理价值进行多维诠释，形成了《儒家论语关键范畴视野下的早期儒家及思想承继》(1992)及《儒家论语中的偏好与选择》(1997)^② 等典型著作。不同于以往王为义将“仁”释为“爱”的神学比附，尼基拉夫夫妇力图还原儒学范畴本义，从诸子流派演进本身探索儒家观念的变迁。譬如，《儒家论语关键范畴视野下的早期儒家及思想承继》即是围绕“天-德-道-礼-义-仁”范畴系统展开，揭示这些观念在儒家及诸子流派（如老、庄、墨、法、阴阳等）中的异同、交织和演变。^③ 由此，笔者将芬兰文儒学百年来代表作的发展线索及最新进展梳理如下（见表2）：

表2 芬兰文百年儒学代表作的发展脉络及最新进展

出版时间	芬兰儒学著作名	中文回译名	出版社/期刊	译作者/著者
1921	<i>Kungfutsen Suuri Oppi. Johdatus Kungfutselaiseen Elämäkatsomukseen</i>	《四书解义》	Helsinki: Otava	Kalle Korhonen
1923	<i>Suuri Oppi</i>	《大学》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 Vol. I, No. 6	Toivo Koskikallio
1923	<i>Kultainen Keskitie</i>	《中庸》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 Vol. I, No. 6	Toivo Koskikallio
1957	<i>Keskitie: Valikoima Kiinalaista viisautta</i>	《中庸：中国智慧选集》	Helsinki: Tammi	Pertti Nieminen, Kristiina Kivivuori, Tuomas Anhava
1958	<i>Kung Fu-Tse Keskustelut (Luen-Y)</i>	《孔夫子：论语》	Porvoo: Werner Söderström Osakeyhtiö/WSOY	Toivo Koskikallio
1958	<i>Kiinan vanhojen filosofien uskonnollinen näkemys</i>	《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宗教观》	Itämaisessa seurassa	Toivo Koskikallio
1959	<i>Mung Tse: Opetukset</i>	《孟子：学理》	Porvoo: Werner Söderström Osakeyhtiö/WSOY	Toivo Koskikallio
1992	<i>Keskustelut (Luen-Y)</i>	《论语》	Porvoo: Werner Söderström Osakeyhtiö/WSOY	Toivo Koskikallio
1992	<i>Early Confucianism and Inherited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Some Key Terms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i>	《儒家论语关键范畴视野下的早期儒家及思想承继》	Helsinki: Societas Orientalis Fennica	Pertti Nikkilä
1997	<i>Preference and Choic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i>	《儒家论语中的偏好与选择》	Helsinki: Societas Orientalis Fennica	Pertti Nikkilä
2000	<i>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i>	《基督教信仰与中国隐秘智慧》	Helsinki: Yliopistopaino Oy	Kaisa Nikkilä
2001	<i>Shih King: Laulujen kirja</i>	《诗经》	Helsinki: Kadetintie	Toivo Koskikallio Jouko Koskikallio
2005	<i>Jadekasvot: Valittuja tarinoita Kiinan muinaisajoilta</i>	《古文观止》(上)	Helsinki: Gaudeamus	Jyrki Kallio
2007	<i>Jadelähde: Valittuja kirjoituksia Kiinan keskiajalta</i>	《古文观止》(中)	Helsinki: Gaudeamus	Jyrki Kallio
2008	<i>Jadepeili: Valittuja kirjoituksia keisarillisen Kiinan kulta-ajoilta</i>	《古文观止》(下)	Helsinki: Gaudeamus	Jyrki Kallio
2008	<i>Liezi: Salaisuuksien tien kulkija</i>	《列子》(注：此为选集，含《论语》等)	Helsinki: Yliopistopaino Oy	Toivo Koskikallio Jouko Koskikallio Petteri Koskikallio
2014	<i>Mestari Kongin keskustelut</i>	《论语》	Helsinki: Gaudeamus	Jyrki Kallio
2020	<i>Mengzi-Veljellisyden tie</i>	《孟子》	Helsinki: Gaudeamus	Jyrki Kallio
2022	<i>Avain kungfutselaisuuteen</i>	《儒学之经》	Helsinki: Gaudeamus	Jyrki Kallio

①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2000.

② Pertti Nikkilä, *Early Confucianism and Inherited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Some Key Terms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Helsinki: Societas Orientalis Fennica, 1992; Pertti Nikkilä, *Preference and Choic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 Helsinki: Societas Orientalis Fennica, 1997.

③ Nikkilä, *Early Confucianism and Inherited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Some Key Terms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pp. 5–12.

通过如上梳理与比较,可以看到,芬兰文儒学百年演进展现出从转译走向直译、从“以神释儒”到“回归儒学”的诠释路径转型与发展规律。

首先,从译介形式角度看,芬兰文儒学体现出“转化、吸收到精细化发展”的演进特点。这一进程蕴含如下具体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科和宁聚合欧陆与北欧主流语种的译介与评点成果,形成了以顾赛芬法译本与理雅各英译本为底本的“四书”转译本,为芬兰文儒学勃兴提供了重要范本;第二阶段,王为义回归中文原典进行直译,但依然保留基督教术语以及神学诠释痕迹;第三阶段,高玉麟重回儒经并开展“汉-芬”直译文本,提供了更为完整与精确的译本。这些阶段透射出芬兰文儒学逐渐剥离欧陆儒学的诠释框架而回归经典本义的传译路径与规律。

其次,从诠释策略角度看,芬兰文儒学展示了“宗教本体论、伦理观、范畴术语”等多重释义架构以及不断还原儒学精神的历史进程。其中,科和宁倾向于以儒学的宗教性来进行儒耶本体论的比较与对话,呈现出儒学译介的“宗教本体性”向度;王为义淡化儒家宗教性而更多强调伦理学层面的儒耶汇通,展现出儒学诠释的“伦理学”向度;尼基拉夫妇的儒学研究侧重范畴术语层面比较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对话(甚至将这些术语具现化为章节结构)^①,体现出“范畴术语”维度的研究路径。这些诠释策略与进路呈现出“立体式”儒学释义的综合图景,从深层次上折射出儒耶异质信仰坐标系相遇中核心价值观的调适与互鉴。

四、余论:芬兰儒学百年文化融构对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外译理论创新的现实启示

作为北欧汉学的重要镜像,芬兰文儒学演进展现出汲取欧陆主流儒学既有译介与研究成果并呈现从转译到直译、从神学格义到回归本义的发展规律,透射出“形上本体-形下伦理-范畴术语”等多维度儒学释义的研究路径与终极信仰对话。这种策略转型与多维诠释模式整体上朝向还原儒学本真并体现耶儒价值观共鸣的方向发展,对当前世界信仰文明互鉴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探索中国哲学外译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与现实意义。

首先,芬兰儒学百年文化融构体现了从转译走向直译的历史规律,内在糅合了神学格义与异质信仰范畴“耦合”的诠释策略,不仅有效地聚合了以往欧陆汉学的既有成果,也渐次提供了契合本土受众阅读心理的不同译本,从广度与深度等层面促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精华的快速传播,并增益了不同信仰核心价值观的和平互动。事实上,转译乃是冰上丝路背景下北欧诸国早期接受汉学的一般形式,而直译则主要归功于部分传教士和探险家后来入华探索的本土化译介实践。两者揭示了中国哲学在北欧传播的不同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格义的策略较普遍地体现于早期转译文本中,其中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利玛窦等神学家曾为此树立了重要典范。这种天主教神学格义为科和宁等早期芬兰传教士所承继并纳入自身路德信义会入华播道的新教诠释逻辑中。同时,科和宁等也将儒学视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将“三纲五常”及宗法礼教中的“仁”与路德神学的“爱”(及背后所涵摄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观)进行了创新的比较,从本体与现象等多重维度搭建了两种异质信仰间关于道德律(天理、圣爱、道成肉身),拯救观(致良知、天人合一、因信称义),理想人格(成圣、称义与成神)等宗教哲学命题的沟通,大大丰富了早期北欧路德新教与中国儒家传统哲学相遇中核心价值观对话的广度与深度。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经典传译既不应抛离世界宗教哲学对话语境而“闭门造车”,亦不应彻底否定百年来欧洲主流语种的格义诠释的既有成果,而应在完善自身概念系统与思维框架基础上,广泛吸收以往传教士汉学家核心范畴的“格义”经验,并促进价值观念(如“仁”与“爱”,“道”与“德”,“气”与“神”等)的重新对话,避免独断与夹生而导致的价值观冲突。换言之,“格义”的方法依然有效,但却需要建立于还原儒学本义的基础上,汲取百年来传教士语境化译介经验而对儒学核心范畴进行异域灵活转化,谨慎地建立“经典-译者-受众”三方的意义关联。在此过程中,应更新过时的旧式神学术语,探寻合乎异域阅读心理的新型词语与概念系统,回避信仰禁忌。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然地要在世界不同宗教文明对话乃至“价值观冲突”的现实语境中进行,但其目的恰恰是要化解价值观冲突,而非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而文明[价值观]的割裂将会是未来战争前沿”的争议性预言。^②

^① Nikkilä, *Early Confucianism and Inherited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Some Key Terms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pp. i-iii.

^②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 22;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p. 19-21.

其次，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及外译理论的创新亦非局限于语言或范畴层面的更新，而是涉及本体论预设、逻辑思维原则、道德心理动机、内在价值精神等综合维度的对话，由此产生的乃是哲学、神学、语义学、道德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立体式架桥”。从百年芬兰儒学译介理论与实践来看，本体论与伦理学层面的交互乃是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儒学之“天/道”“功德”“义气”及相应的“成圣”观与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上帝”“恩典/礼物”“称义”及“成神”论有显著观念差异。这些差异曾导致早期传教士对儒学经典进行了叛教式误读，同时也在宣教实践中遇到了不少挑战。^①为回避这些观念冲突并促进价值共鸣，这些神学家也从不同维度对儒学经典进行尝试性诠释：科和宁侧重从本体上探察儒家的宗教性而将其“天道”观与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相比较，进而探讨两者关于“成圣”人格理想的异同；王为义侧重从伦理学与道德心理学角度来审视儒家之“仁”并将其释作“爱”，构成了儒耶“仁-爱”观的对话；尼基拉夫妇则回归孔学及诸子原典本身，对早期儒家“天-德-道-礼-义-仁”等关键性范畴进行流派间的横向比较，揭示出中国儒学传统内在价值逻辑与精神意蕴。这些诠释向路已经超越了任何单一学科架构。因此，还原儒学精神、促进内在“灵魂共鸣”进而推进儒学经典在异域的传播，客观上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摒弃长期以来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学科壁垒，而代之以“立体式”交叉视野，对文本进行系统分析与灵魂透射。这种打破学科壁垒、基于客体现象而进行系统性还原与价值观透射的研究进路，近些年来被概括为芬兰式“学科融合式研究”与“主题式现象教育”理念^②，为构建复合型新型外译理论及知识创新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综上所述，不同于海上丝路以天主教为中心的儒学西渐线索，冰上丝路展现出新教视野下转译与直译相交织的中国哲学北传图景。冰上丝路的儒学传播相对晚起但却汲取了海上儒学传译神学格义策略的历史经验。其中，芬兰文儒学译介与研究的世纪变迁为此提供了典范性样本参照。芬兰文语境中以神释儒到还原本义继而进行异质信仰范畴“耦合”的诠释策略转型，展现出耶儒异质信仰坐标系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调适进程。然而这种调适不应被理解为语义学层面的简单转化，而应充分考虑到背后本体论预设、逻辑思维原则、内在结构骨架、精神价值意蕴等多维层面的汇通，从而为当前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实现新型中国哲学传播理论的可能性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镜鉴。

(责任编辑：潘纯琳)

① 见 Kalle Korhonen eds. , *Kuohuan Kiinan Keskellä*, JUVA: WSOY, 1928; Toivo Koskikallio and Inkeri Koskikallio, *Inkerin Päiväkirjan Lehtiä*, Kuopio: Kirjapaino Oy Savo, 1960; Nikkilä, *Kristillinen Usko ja Kiinan Salattu Viisaus: Toivo Koskikallion Teologia ja Sen Kiinalainen Konteksti*, pp. 21-22; 191-192.

② 见 Kirsi Lonka, *Phenomenal Learning from Finland*, Helsinki: Otava, 2018; Vasileios Symeonidis and Johanna Schwarz, "Phenomenon-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the Pedagogical Lenses of Phenomenology: The Recent Curriculum Reform in Finland," *Forum Oświatowe*, vol. 28, no. 2, 2016, pp. 31-47.